

推动新时代文旅融合深度发展

□ 周耀林 戴有山

文化和旅游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有明确的边界,但又常常相互渗透、交叉、融合。根据不久前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成立文化和旅游部。这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将为建设文化强国增添动力。

根据2017年旅游卫星账户统计数据,我国出境旅游人数数量巨大,全域旅游发展迅猛,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居民流动性强,产生了多重“大国效应”,将旅游业与国民基数、旅游景区的运营质量对标分析可见,我国旅游业与旅游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处于低端化运转阶段,亟须文化导向和文化指引。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用旅游的方式传播文化,有助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当前我国文旅业存在的发展瓶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从“高速”到“高质量”、从“增长”转向“发展”,与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符合。增长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其要义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这正是当下我国文化和旅游发展所呈现的新特征。

进入新时代,文化和旅游融合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我国文旅业的发展体量和市场规模已走在世界前列,但从产业发展质量和整体效益上看,仍处于发展初期,总体上受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其瓶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我国文旅业融合发展战略与理想状态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目前,我国文化和旅游融合领域还较为单一,深度合作方面有待加强。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文化内涵的挖掘不够深入,很多区域的悠久文化尚未得到很好彰显,旅游景区特色定位不够准确、清晰,一些地方忽略了文化在旅游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存在短板;文化、旅游的合作不够畅通,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部门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管理不精细不严格、

流程不清晰不科学等现象;各地政府在政策支持上缺乏协调机制,宏观调控作用尚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对产业的促进性不明显,在税收、财政、产业扶持上的相关政策尚不完善,文化和旅游市场不够规范等。

国民收入不平衡影响对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认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目前全国人口约为13.38亿,“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占人口1/5的高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59259元(月均4938元),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52元(月均702元)。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相差10倍以上。收入的不平衡直接导致对文化和旅游消费认知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化和旅游的发展。此外,我国当前的文化和旅游产品设计总体上还处于跟随阶段,缺少引领时尚的创意性产品;缺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个性化产品;缺少文旅与科技融合的高端产品。

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不够、区域发展不平衡。我国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可供观光的旅游景区有一万余处,而已开发并具有接待国内外游客能力的景区仅有1800余处,不足总数的五分之一。文化旅游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同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规划不当、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中国国内旅游年度发展报告2017》指出,我国国内旅游产业发展东强西弱,南强北弱。“旅游发展指数”从东向西、从南向北递减,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之间对标数值为0.56:0.47:0.28:0.23;全国游客接待量比例,东部地区占37%,中部地区占27%,西部地区占29%,东北地区占7%;全国旅游总收入比例,东部地区占45%,中部地区占22%,西部地区占26%,东北地区占7%;旅游目的地的接待能力从东向西递减,而东、中、西“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表现为5:3:2的三级阶梯状分布。

文化旅游配套设施不够完善,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文化旅游基础设施,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旅游交通业、餐饮酒店业,也包括融入新技术的旅游信息化基础设施等。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尤其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文化旅游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东部特大城市群和中西部大城市等基础设施完善的地方仍是主要的旅游目的地。

发展资金不足,投融资渠道单一。发掘文化旅游业价值,要以文化为底蕴,以历史文物景观及文化



6月10日,山西临汾举办首届尧都文化旅游节,通过祭祖、演出、推介会、展览等多项主题活动,打造当地文化旅游新名片。

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我国目前文化旅游发展的主要资金来自政府投入,民营资本介入很少,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化旅游业长远发展。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传统的中国文旅业发生了很多变化,涌现出了旅游综合体、特色小镇等全新的概念,投资规模、表现形式和产业布局也有了很大变化。新时代文旅业的开发重点已从景区投资、大体量重资产转向更好挖掘开发文化、思想、科学、技术、艺术等对文旅业具有促进作用的隐性资产。由此,推动新时代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应在以下五个方面重点发力: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构建大产业体系。文化和旅游同属于精神需求消费内容,推进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和规划,给予一定优惠政策倾斜,充分释放文化和旅游结合的红利。一方面,在文化和旅游部完成融合的基础上,在2018年底前完成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部门的融合;在2019年底前对全国省、市、县三级文化和旅游部门进行全面融合。在编制上与中央的顶层设计紧密结合,形成从上到下统筹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对全域旅游的发展加大宏观调控作用,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文化和旅游为主导,形成多种新的

旅游业态、旅游产品,共同构建文旅大产业体系,提升文化产业的附加值,把文旅产业链条向上下游延伸,拓展文旅产业发展空间。

创新融合体系,实现文化和旅游无缝连接。要创新融合体系,打造旅游精品项目,结合区域优势和特色,构建更具内涵的文化旅游项目;要协调好区域之间旅游集团的融合发展,在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建立后,对省、市、县三级文化旅游部门实施统一管理,完善营销战略和宣传手段,推动旅游热潮的兴起;在掌握文旅系统百姓需求和资本规范接口的基础上,开发出与上下游需求兼容的文旅产品,更多采取能够满足百姓旅游需求并与旅游投资相匹配的开发手段,以便更好地推进文化产品创新开发,推动文化产业规模化发展。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融合发展新形式。旅游是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弘扬特色文化,丰富新的旅游模式,将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结合起来。在弘扬中国革命精神的红色旅游、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俗旅游、体验祖国大好河山的田园风光旅游等的开发中,要以多样化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弘扬与对外传播。结合民俗文化、民间工艺体验旅游等的开发,保护和传承民间艺术,推动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促进传统工艺提高品质、形成品牌,走上产业化发展之路。在打造文化旅游品牌的同时,注重知识

内涵发掘,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构筑多元立体的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形式。

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用文化和旅游讲好中国故事。近年来,随着国际入境旅游、文化旅游交流年、主题旅游年等的开展,旅游已经成为我国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如中俄旅游年、中美旅游年、中丹旅游年等,都是重大文化交流活动。这些以旅游为载体和平台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不仅刺激着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而且推动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在文化交流中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在技术、资源、市场、产业上进行深度融合。在技术融合方面,要通过对现有的技术进行创新,改变原有技术和工艺流程,减少同质化技术,形成共同的技术基础,消除技术壁垒。在资源融合方面,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具有较大重合性,进入新时代,要通过创新创造,使最新的开发技术得到有效整合利用,既保护有形文化资源,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更多旅游者,实现产业发展和文化保护的双赢。在市场融合方面,要通过市场的创新整合、共同品牌的培育、资本整体运营来推动和实现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在产业融合方面,要使打造文旅产业集团成为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重要载体,着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文化会展业、娱乐业、动漫业等。

(作者分别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职业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到信息共享、问题共研、政策共制、效果共评;加强与社会实践主体的互动,从研究选题、数据采集、现状调研、政策评估等方面形成与研究对象的沟通与反馈机制;注重与传播媒体的合作,让智库专业、理性的声音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声,引导社会认知。

建立“智力资源管理体系”。一方面高校应对自身的智力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在招聘、选拔、培训、考核、激励等方面设定一系列类似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和做法,引导学者围绕智库的需求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要着力构建“大外围”的智力资源体系,运用现代先进技术手段对不同类型、不同职业、不同界别的智力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促使其在参与智库研究中更好地发挥所长。

提升智库运营团队的专业性与职业化水平。应摒弃高校传统的行政管理思维,对运营团队“去行政化”。要因校而异,因需设岗,选拔专业人士,并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待遇,注重绩效考核和激励。同时,实行运营团队的职业化,搭建晋升通道,提升其人力资本价值,让运营力成为智库研究力的重要支撑。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助理)

以“新时代·新挑战·新作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主题的2018中社智库论坛近日在京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等国家高端智库代表与会,就新时代新型智库建设的新挑战新作为发表看法,并就如何建设高水平智库、更好让智库成果脱颖而出等提出对策建议。

探索真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更为坚实的智力支持

智库建设有其规律可循,也有最为直接的核心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表示,在当下新型智库的建设热潮中,要注重内容为王、渠道为先,注重打造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最为重要的是,要探究真问题,让自身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

“探究真问题”,专家学者纷纷就此发表观点。在吉林省政协主席江泽林看来,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减贫事业大发展的40年,国家扶贫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他强调,建立精准扶贫长效机制很重要,要从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医疗与公共服务相结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探索建立扶贫长效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生态环境治理是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战斗。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环保产业的发展,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国已具备解决环境问题能力。当前,要着力打好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和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尽快划出生态保护红线。在这一过程中,除强化政府作用外,还要更多地使用市场的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强调,中国在过去40年里,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基本理念和主体思路已经发展成熟,所验证,其秉承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和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理念相一致。

新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王镛结合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对外交流的主观感受和亲身体验,强调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希望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发展方案,借鉴参考中国智慧。他表示,讲好此类中国故事,需要从事专业化研究的智库学者,也需要专业化的平台和抓手把各种力量聚合起来。

秉持真精神:以靠谱管用的智库产品辅助决策

智库研究要树立需求导向,按照现实需求解决问题,也要有科学态度,向决策部门反映真实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针对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提出,首先,要坚持调研在先。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建议权。尽管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需要以扎实的调研和长时间的跟踪作为前提。其次,企业跟进要理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很多企业积极行动起来,但由于缺乏对当地法律、制度

的足够了解,有些企业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再次,法律做保障。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做落地,关键要靠法律做保障。最后,舆论要配合。要发挥新型智库在人文交流、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促进民心相通。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银温泉表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应该重视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在社会科学领域,首先,要改革现有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积极探索对包括智库机构在内的科研单位的激励方案等重大现实问题,与智库专家联手推出具有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精品智库成果。“新时代,要在深度开发现有资源基础上搭建智库平台,拓宽科研成果转化渠道,升级与相关领域智库的合作模式,积极应对数字经济时代媒体融合的新形势,做好智库产品的数字化传播工作。”赵剑英表示。

真正树立“四个自信”,对于抱有建设性态度、在独立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见解要充分理解、积极鼓励,决不随意打棍子、扣帽子。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旭阳以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为例分析了当前高校智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四不”现象:“看不见”,很多党政高层决策是机密的,如果了解,研究和需求之间就无法得到很好的对接;“听不见”,没有机会参与研究所涉问题的高层会议,在贯彻落实中央最新要求上很难跟上形势发展。“进不来”,很多问题的国外为中心,发展思想出发,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基本理念和主体思路已经发展成熟,所验证,其秉承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和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理念相一致。

搭建大平台:汇聚更多讲述精彩中国故事的好声音

智库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认为,智库是围绕问题提出系统化对策建议和战略分析的研究机构,依托智库平台的研究成果不应满足于发现问题或止步于批判现实,而应突出“用”字。作为平台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要善于“拼接”,把需求方和供给方有效对接起来,找到作为出版系统的智库平台的独特运行路径。

立足

来自

2018
社智
张胜

真正树立“四个自信”,对于抱有建设性态度、在独立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见解要充分理解、积极鼓励,决不随意打棍子、扣帽子。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旭阳以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为例分析了当前高校智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四不”现象:“看不见”,很多党政高层决策是机密的,如果了解,研究和需求之间就无法得到很好的对接;“听不见”,没有机会参与研究所涉问题的高层会议,在贯彻落实中央最新要求上很难跟上形势发展。“进不来”,很多问题的国外为中心,发展思想出发,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基本理念和主体思路已经发展成熟,所验证,其秉承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和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理念相一致。

真正树立“四个自信”,对于抱有建设性态度、在独立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见解要充分理解、积极鼓励,决不随意打棍子、扣帽子。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旭阳以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为例分析了当前高校智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四不”现象:“看不见”,很多党政高层决策是机密的,如果了解,研究和需求之间就无法得到很好的对接;“听不见”,没有机会参与研究所涉问题的高层会议,在贯彻落实中央最新要求上很难跟上形势发展。“进不来”,很多问题的国外为中心,发展思想出发,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基本理念和主体思路已经发展成熟,所验证,其秉承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和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理念相一致。

真正树立“四个自信”,对于抱有建设性态度、在独立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见解要充分理解、积极鼓励,决不随意打棍子、扣帽子。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旭阳以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为例分析了当前高校智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四不”现象:“看不见”,很多党政高层决策是机密的,如果了解,研究和需求之间就无法得到很好的对接;“听不见”,没有机会参与研究所涉问题的高层会议,在贯彻落实中央最新要求上很难跟上形势发展。“进不来”,很多问题的国外为中心,发展思想出发,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基本理念和主体思路已经发展成熟,所验证,其秉承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和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理念相一致。

真正树立“四个自信”,对于抱有建设性态度、在独立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见解要充分理解、积极鼓励,决不随意打棍子、扣帽子。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旭阳以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为例分析了当前高校智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四不”现象:“看不见”,很多党政高层决策是机密的,如果了解,研究和需求之间就无法得到很好的对接;“听不见”,没有机会参与研究所涉问题的高层会议,在贯彻落实中央最新要求上很难跟上形势发展。“进不来”,很多问题的国外为中心,发展思想出发,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基本理念和主体思路已经发展成熟,所验证,其秉承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和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理念相一致。

真正树立“四个自信”,对于抱有建设性态度、在独立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见解要充分理解、积极鼓励,决不随意打棍子、扣帽子。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旭阳以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为例分析了当前高校智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四不”现象:“看不见”,很多党政高层决策是机密的,如果了解,研究和需求之间就无法得到很好的对接;“听不见”,没有机会参与研究所涉问题的高层会议,在贯彻落实中央最新要求上很难跟上形势发展。“进不来”,很多问题的国外为中心,发展思想出发,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基本理念和主体思路已经发展成熟,所验证,其秉承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和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理念相一致。

真正树立“四个自信”,对于抱有建设性态度、在独立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见解要充分理解、积极鼓励,决不随意打棍子、扣帽子。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旭阳以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为例分析了当前高校智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四不”现象:“看不见”,很多党政高层决策是机密的,如果了解,研究和需求之间就无法得到很好的对接;“听不见”,没有机会参与研究所涉问题的高层会议,在贯彻落实中央最新要求上很难跟上形势发展。“进不来”,很多问题的国外为中心,发展思想出发,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基本理念和主体思路已经发展成熟,所验证,其秉承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和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理念相一致。

扬长补短 建设新型高校智库

□ 徐宁

作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高等院校作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力量,应把握时代机遇,找准自身定位,主动发挥优势,组织力量积极参与新型智库建设。

高校在智库建设中具有学科齐全、人才密集、对外交流广泛等优势,但也存在体制机制僵化、考核激励导向单一等问题。建设新型高校智库,应以服务中央和地方政府决策为根本方向,着力提升研究能力,确保研究成果务实管用。对标中央要求与实践需求,概括而言,高校建设新型智库主要存在五方面的长项与短板。

理论性研究较强而应用性研究不足。理论性研究的目的是发掘知识与发现规律;应用性研究的着力点在于通过规律性研究解决社会实践问题。由于目前高校采用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主的成果评价体系,大部分学者的关注点仍放在能否取得理论研究成果及发表高级别论文的数量上;而智库必须聚焦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分析其形成原因、发展走势,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供决策部门参考。

非对立关系,而应相互促进、相互转化。高校在建设新型智库中具备明显的理论性研究优势,如对重大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和储备性研究的能力等,但如何将该优势有效地转化成智库研究所要求的应用性研究能力,需要高校从研究氛围、激励导向和体制机制上进行探索和创新。

个体研究居多而协同研究不足。很多高校学者进行研究时,习惯以个人的研究兴趣为主要考虑因素,对某个锁定的研究领域进行持续深入挖掘。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从事研究工作往往主要依靠个人或同领域团队的智慧与力量。而智库研究需要进行跨学科、跨领域、跨职业的协同与合作,这恰恰是高校学者需要加强的。

新型智库建设必须以服务决策部门需求为导向,聚焦主题,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开展协同研究。对于高校而言,特别要注意进行跨领域合作,将政府决策部门和社会实践领域的相关人士整合进来,在发挥高校在理论基础、分析方法、研究平台、科研队伍等方面优势的同时,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维度的协同研究。

研究的深度突出而速度不足。高校学者擅长深入挖掘分析的传统研究方式,而往往忽略研究的时效性与应用性,对现实社会发展出现的紧迫性问题关注不够或者反应

较慢,在进行智库研究时,其研究成果难以满足时效性要求。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研究深度是智库研究的“基石”。高校建设高端智库,应当首先坚持其研究的“专”与“深”,聚焦某个领域或某个重要问题,在夯实研究基础、拓展研究深度的同时,保持对时事问题和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的敏感性与关注度,基于坚实的研究基础对当下社会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研判、跟踪、评估,形成研究报告,用其专业、深入、理性的研究成果支撑政府决策、引导社会舆论、引领公众认知。

学术语言能力强而语言转换能力不足。高校学者习惯使用学术化的表达方式,注重概念表达的准确性,逻辑推演的严密性、完整性以及论据的有效性等,部分文章中还大量使用模型、计量等专业性强的术语,仅有专业人士才能理解。

智库研究成果的受众包括非专业人士,因此高校的研究者应当具备学术语言转换的能力:了解政府部门的公文表达方式和公众大众所能接受的通俗表达方式,使学术研究成果易于被受众接受。

研究力较强而运营力不足。新型智库的研究是包含选题、调研、分析、行文、成果转化等各环节在内的完整“研究链条”,靠学者“单打独斗”无法实现,需要充分整合政府、

学者、媒体、社会组织等力量,以实现咨政建言、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等职能。

高校的智库运营涉及行政、人力资源、传播、媒体、公共关系、国际外交等各方面。比如,在研究选题和调研方面,应充分注重与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对接联络,让参与研究的各方相互了解、深入合作,并进行有效整合;在研究的应用环节,应注重与政府决策部门的合作。在研究人员的遴选、培训、考核等方面,运营能力十分重要,这些却是高校研究机构经常忽略的。

鉴于以上分析,对高校建设新型智库提出以下四方面建议:**创新完善成果评价体系。**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的评价体系都是基于教学成果、发表论文、申请国家项目等方面建立的,难以有效激励学者积极参与智库研究。建议在高校研究人员体系里建立“智库专区”,开辟专属智库研究人员的晋升通道,对智库类成果(如决策咨询报告、重要媒体发文、社会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进行多元化评价考核,建立区别于传统科研成果的分类评价制度。

搭建互动平台。高校应积极为智库研究人员搭建与政府决策部门互动平台,让相关领域的学者参与政府决策咨询的各个环节,如政策论证、评估,政策调研、研讨等,做



总第175期,了解更多《智库》周刊内容请扫描二维码关注《智库》周刊微信公众号。

智库

理论部主办
联系电话:010-67078979 电子邮箱:gmthinktank@126.com